

■新作聚焦 弋舟长篇小说《我们的脚蹑》：

让我们重谈“爱情”

□行超

异性和权力的诱惑时，她该如何抵挡人的本心中那份对于诱惑的渴望？也许惟一的方式是，她拥有，或是她想象自己拥有比这诱惑更强大的资本。又或者，这种抵抗其根本就是欲拒还迎。就这样，两千年前的故事便与当下，与李选，与我们发生了联系。

作为新时代的“使君”，曾铨在面对李选时，除了不错的社会地位、财富和不算差的外表，更大的砝码无疑是两人之间那“被偷走”的30年。30年前的两人是小学同学，虽然没有更多的过往，但至少彼此还有个不错的印象。30年后的现在，曾铨成了小有名气的画家，与李选一样，经历了离异。两人再度重逢，横亘在30年岁月中所有的回忆、痛苦以及内心那份残存的对爱情和未来的期许都泛起了沉渣，你来我往，这两个多少经历过一些人生起伏的人，仿佛劫后余生般地，在惺惺相惜中生发出一些情愫。然而正如张爱玲在《金锁记》里说过的，“老年人回忆中的30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30年后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当李选发现自己对曾铨真的动情了，而曾铨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爱上了李选时，他们却不敢真的去爱了——30年毕竟太久了，这30年中他们各自经历了什么都无从知晓，更没有勇气去知晓。在浩大的岁月面前，妄谈爱情，显得那么荒唐，那么不切实际。

一场突如其来，将这段似乎刚要开始的感情推向了死角。醉酒的曾铨撞伤了行人，几乎是奋不顾身地，李选推走了曾铨，替他顶上了酒驾伤人的罪名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麻烦。李选，这个动了心的罗敷，她当然没有办法招架这些麻烦，只能求助于多年来庇护着她的老板张立均。与“悬着”的曾铨相比，张立均更贴近现实生活中的成功中年男人形象。他有财富、有权利，并且善用这财富和权力，让自己在他人眼中成为了一个无所不能的强者。

张立均是李选“背后的男人”吗？恐怕他们彼此都不能承认这一点。张立均对李选的兴趣起源于他的憔悴和不安，这激起了张立均的保护欲。随之而来的是他作为一个强势男性的控制欲，轻易地开除跟李选一起出差喝酒的年轻人、几次短信的试探，甚至利用自己的关系摆平交警队的问题，在这一切的行动中，张立均都是在扮演一个可以掌控一切的、随时可以成为救世主的角色。在与李选的关系中，他习惯了一切都由他来调度，去茶馆、去酒店，他需要李选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他希望李选永远依赖他，甚至是依附于他。所以，当他发现他所保护的李选实际上是在保护另一个男人时，当他得知李选居然可以不依靠自己而筹得了那笔数额巨大的伤者抚恤金时，一往无前的他内心也开始“脚蹑”了。

在小说中，李选、李兰，甚至是黄雅莉，她们就像现代都市中的大部分女人一样，即使平日生活得再光鲜，在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时，都分明感受到“这个世界和自己彻底失去了联系”，孤身一人面对孤独。在这个社会中，她们必须依靠男人才能生活得不那么艰难：李选要依靠张立均帮她处理交通事故，又必须通过向雷错借钱来了结与伤者家属的纠缠；与丈夫关系不佳的李兰不得不为了所谓业务的业务，在酒桌上与各色人等拼酒，最终把自己喝得走样；即使聪明通达如黄雅莉，也大抵是依靠与各种男人暧昧的关系及“清醒的定位”而走向了成功和成熟。我们无需回避，弋舟也并不粉饰，这基本上是一个男性掌握权力的时代。

然而在情感世界中却不是这样。在男女关系中，女人的勇敢和坚强常常出人意料。张立均的妻子曾经出轨，为了自己所谓的前途，他不得不忍气吞声地维持这段婚姻，但心里的裂痕却无法抹去。这个看似强悍、拥有权力和财富的男人，实际上非常需要黄雅莉这样极尽体贴而又不失分寸的女人带他走出困局。对于李选，当他给她发出那些试探性的短信又不肯承认时，他确乎已经爱上了她。“那个‘爱’字就在嘴边，但他发现，原来将要说出这个字时，自己会多么的犹豫”，也许就是在这样的瞬间，强大的张立均轰然倒塌，变得像李选一样虚弱而憔悴，甚至在情感上更卑微、更需要李选这样的女人来救赎的可怜人。

当然还有曾铨。曾铨不仅撒手一场由自己而起的车祸，在与李选的情感世界中，他也变成了一个肇事逃逸者。情感中犯下了错误曾铨无力弥补，他只能再次回归世俗世界中男人所惯用的那套方式——用金钱承担自己的经济责任。逃逸的曾铨再次来到了自己前妻的身边，“多年来，曾铨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每当他的人生遭遇坎坷，他便会身不由己地奔赴自己的前妻身边”。前妻戴瑶对于曾铨来说是一个永恒的避风港，她一如既往地缓解着他的不安与焦虑，“她像个教师，而曾铨，像一个时常犯错的学生”，“他从戴瑶这里获取的，只是一种犹如母亲一般的关怀，甚至可以这么说——在戴瑶这里，他可以像一个儿子般地撒娇”。曾铨对于戴瑶的依赖，并非法律关系的改变可以割裂的，这种依赖根深蒂固地藏在曾铨的骨子里，又或者，这依赖也不仅仅是对于戴瑶，很大程度上是对于女性。因此，曾铨会在情感脆弱的时候对李兰说“我想你”，他并非对这个发了脾的初恋还有什么想法，而是希望有人能再次给他那“来自女性的无以复加的温柔”，带他走出“男人生命的困局”。在世俗世界中，女性不可避免地成了弱者，然而在情感世界中，女性却总是在扮演救赎者的角色。



曾铨是弋舟笔下典型的“刘晓东”式的人物，他看似是《而黑夜已至》的徐果口中的“强势阶层”，但在内心深处，他孤独、脚蹑，他的内心深藏着秘密，甚至承受着比常人更沉重的心理负担。不同的是，刘晓东们自我判定的抑郁症以及他们内心的罪恶感，基本上都来自于时代和社会。在《所有路的尽头》《等深》中，刘晓东是上世纪80年代的“遗老”，那个年代的经历和回忆深深烙在他们心头，一生都无法抹去。然而在曾铨这里，弋舟隐去了时代与社会的原因，这让曾铨的孤独变得更为深刻——这种孤独来自人性本身，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永恒面对的。曾铨的孤独，也就是我们每一个的孤独。

然而当弋舟选择了书写人性之孤独，选择了书写爱情的驳杂与在爱情中的人的脚蹑时，他面对的是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在这样的题材面前，所有的讨论都难以企及它最后的答案，更不必说，这只是一部区区十余万字的小说。正如弋舟在后记中所说，“这部小说断断续续写了很久，其间各种生活的纷扰还在其次，时常中断写作的根本原因，更在于我心中不时生出的厌弃之情——我几乎是在时刻怀疑着，这一次的写作，真的有意义吗？”在面对这样复杂的问题时，弋舟似乎还需要再耐心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写出现实的无奈、爱情的幽暗以及时光对人的消磨。

正像小说中黄雅莉所说，“脚蹑是一种古典情调”，在当下，大多数人早已忘了在爱情中脚蹑，这件复杂、纠结而充满意味的事变成了赤裸裸的、简单的现实。如今还在青春期的这一代人，甚至开口便说“再也不相信爱情了”，多么让人遗憾，他们还未长大就老了。在这个“爱情”令人羞于启齿的年代，因为弋舟的《我们的脚蹑》，让我可以理直气壮地重谈爱情。

■创作谈

在这个时代，几位各自经历了人间炎凉的沧桑男女，将如何相爱？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本身便足以令人脚蹑。当我们把“爱”规定在“这个时代”与“沧桑男女”的前提之下，问题似乎便可置换成另一个更为严厉的诘问：在这个时代，几位各自经历了人间炎凉的沧桑男女，是否还有爱与被爱的可能？

脚蹑是因为，首先我们深知“这个时代”的所有滋味。“这个时代”的一切滋味，都被我们曾经、正在、将要充分地领受着，个中甘苦，端的是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那么，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如果非要给出答案，我只能如是回答：结合着“爱”的图景，这是一个“非诚勿扰”的时代，是一个电视相亲秀盛行的时代，是一个男男女女可以大大方方在屏幕上以香车宝马为资本来定价爱情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交换，空前地成为了爱情约定俗成的第一要义，理直气壮，连成又连朽着一桩又一桩的爱情。

脚蹑还因为，我们一样深知“几位各自经历了人间炎凉的沧桑男女”，该有何等的仓皇。同样结合着“爱”的图景，正好比：一次次的挫败让男人女人成熟，也难以从我们的生命之中涤荡而尽。在这个意义上，“那个时代”的罗敷与“这个时代”的李选，古今同慨，又几乎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只不过，这个时代的李选，面临着比那个时代的罗敷更为芜杂的局面——毋宁说，权力与资本在这个时代更具有锐不可当的诱惑力与掠夺性；毋宁说，这个时代的曾铨、张立均比那个时代的使君更加幽暗与叵测，欲望更加曲折诡谲；毋宁说，这个时代的李选比那个时代的罗敷更多出了许多的不甘、许多的迎难而上的果决的动力。李选以及张立均、曾铨们，与这个时代是一种共谋的关系，她乃至他们，甘愿与它达成那种“约定俗成”的互动。她、他们，当然还有我们，即是这个时代的“脚蹑”酿成者。

这是一连串的追求，而且几乎无解。

在这种多重的脚蹑之下，我们之所以还要喋喋不休地谈论着爱，我想，那只是因为对于“爱”的盼望，永远也难以从我们的生命之中涤荡而尽。在这个意义上，“那个时代”的罗敷与“这个时代”的李选，古今同慨，又几乎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只不过，这个时代的李选，面临着比那个时代的罗敷更为芜杂的局面——毋宁说，权力与资本在这个时代更具有锐不可当的诱惑力与掠夺性；毋宁说，这个时代的曾铨、张立均比那个时代的使君更加幽暗与叵测，欲望更加曲折诡谲；毋宁说，这个时代的李选比那个时代的罗敷更多出了许多的不甘、许多的迎难而上的果决的动力。李选以及张立均、曾铨们，与这个时代是一种共谋的关系，她乃至他们，甘愿与它达成那种“约定俗成”的互动。她、他们，当然还有我们，即是这个时代的“脚蹑”酿成者。

但我绝不是谴责，我是在唏嘘，是在人性的复杂面前喟叹。

这部小说断断续续写了很久，对于我而言，这是一次写作观念上的自觉调整，我力求让自己的目光贴近“现实主义”一些，以一种不那么波澜四起的笔触来描画我们身边的物事，我得承认，这次调整，令我获益良多，令我有了重新思考写作之何为的一个机会。但是，这次调整居然延宕了许多时日。其间各种生活的纷扰还在其次，时常中断写作的根本原因，更在于我自己心中不时生出的厌弃之情——我几乎是在时刻怀疑着，这一次的写作，真的有意义吗？以这种近乎“现实主义”的方式描述我们生命中的渣滓面，真的有必要吗？这种感觉在我的写作经验中从未有过，它直接导致出我时升起想要放弃这部小说的念头。在编辑的鼓励下，我最终坚持了下来，这也成为了我写作生涯中的“命定”，成就了我对自己“现实主义”般的写作训练。

■第一感受

外在生活与内在生活

□刘庆邦

萧习华一直在做煤矿企业的管理工作，在做好外在的管理工作之余，他信念坚定，意志坚强，始终没有放弃内在的生活。近日读了他的散文集《水流云在》，让我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想。

人类世界由两个世界构成，一个是物质世界，一个是精神世界。参与建设物质世界的人比较多，而参与建设精神世界的人相对少一些。与两个世界相对应，人类的日常生活大抵分为两种，一种是外在生活，一种是内在生活。外在生活几乎具有强制性，只要我们还生存着，外在生活就必须日复一日地进行。相比之下，内在生活有一些选择性，像选题作文一样。你选了这个题目，做一做当然好。你不做这个题目呢，也不会影响生存。

所谓外在生活，就是物质生活、客观生活，表面性的生活。内在生活呢，就是精神生活，主观生活，发生在心灵时间和心灵空间里的生活。过外在的生活容易些，在惯性的作用下，人们每天的外在生活不知不觉就开始了。过内在的生活就不那么容易，不是谁想过就能过的。有人知道内在生活挺不错，也想过一过内在的生活，但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被外在生活挤占了，以致无暇静下心来过内在的生活。比如一些企业管理干部，持续不断的管理工作常常使他们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一旦放松下来，他们还是愿意选择外在的娱乐性生活，以调整自己的身心。对于萧习华来说，笔就是他的抓手，写作就是他的途径。他写诗歌、写散文、写报告文学，还写小说，取得了不俗的创作成绩。散文集《水流云在》就是他心灵生活的最新成果，内心世界的最新呈现。

《水流云在》由“长河帆影”、“山水琴音”和“煤乡风雪”三辑组成，写故土情怀、游历感悟和矿山风云。萧习华的生活底蕴丰厚，写作态度诚恳，文字朴实而富有诗性，每个小辑里收录的作品都很好读。我18岁到矿上当工人，自以为当矿工比较早，对煤矿生活也比较熟

悉。看了萧习华写矿工生活的散文，我知道他17岁那年就下井当上了一名采煤工，煤矿生活的经历比我还要丰富。萧习华长期在四川的煤矿工作、生活，他写的一些川地煤矿的细节我从没见过，也没听说过。比如《一壁坟莹山河在》里写到的威远煤矿是1940年始建，孙越崎为第一任矿长。大饥荒时期的1960年产煤量最高，达98.89万吨。也就在这一年，全矿工亡矿工41人。矿工死后，家人在附近的崖壁上凿一方孔，放入骨灰盒，孔口置一块小小墓碑，碑上刻有逝者的名字和简单铭文，以志纪念。墓室数百上千，纵横排列，井然有序，让人肃然，震撼。如今，完成使命的威远煤矿已经关闭，可坚守在崖壁上的矿工没有离开，他们还对着煤矿久久地凝望着，直至永远。

让我为之感动的还有萧习华写亲人的一些篇章。《飞扬的红盖头》写的是他的祖母，《父亲的冬日》和《父亲不说话》写的是他的父亲。萧习华是怀着深切的感恩之心，饱蘸着情感的泪水，在抒写这些不得不写的散文。可以说，这是萧习华的泣血之作，也是立碑之作，他在用自己的文章为亲人立碑。

有一年春天，我在外地开会。某日下午散步，我看见一位脸上留有煤痕的老矿工在开荒种高粱，就上前与他攀谈了一会儿。攀谈中得知，老矿工种高粱不是为了自家吃，而是用于喂鸽子，他喜欢看一群鸽子在天空中飞翔的样子。老矿工的话让我想到，一个人的外在生活和内在生活并不是割裂的，而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种高粱的体力劳动是一种外在生活的活法，那么，他在种高粱过程中对于鸽群在天空中飞翔的美好想象，就是一种内在的生活。同样的道理，萧习华的外在生活和内在生活也是互为表里，互相支持、互相滋润、互相促进。也就是说，他繁忙的外在生活，不但不会让他放弃内在生活，只会给他的内在生活增添更多的素材。而内在生活的持久修炼，会使他的内心更丰富，情感更饱满，为人更真诚，工作更勤勉，人格更完善。

■短评

喧嚣时代的孤独和忧伤

□刘小娟

孙健敏上世纪90年代就读于北大中文系，沾染了80年代文学繁荣浪潮的余晖，经历了其后文学泡沫渐次消解、破灭的过程。他的小说《世纪列车号上的漂亮女孩》和《莉莉一起跳舞的七个夜晚》承载了他的文学情怀，读罢便会被其中“悠长的余味”萦绕着。

《和莉莉一起跳舞的七个夜晚》回望过去，描摹“从1912年帝制结束到1945年国内战争开始之间的悲欢历史”。《世纪列车号上的漂亮女孩》书写现代——我们刚刚经历过的火热喧嚣的“急剧变化的历史”。两本书穿插着读完，有些章节反复回看，一行行铅字中，永远热闹、永远不缺少故事、永远喧嚣的时代，浮现出难以言表的“孤独和忧伤”。

这两本书是孙健敏对时代的总结，他窥见了时代的孤独和忧伤，用铅字凝结下来，等待我们翻看，获得共鸣。当你随拥挤的人群在地铁穿行，望着浩浩荡荡的人群奔涌向前，你会想起这两本书中的某些意象、某些词句，它们给你疲惫的躯体带来温暖的抚慰。

《和莉莉一起跳舞的七个夜晚》有魔幻色彩，主人公“孔非斯”七度穿越，只为寻求和他命运息息相关的神秘女郎 Lily（中文名莉莉）。七次穿越的时间点，都是中国历史的重要节点。首次穿越是在1912年，帝制结束那年，青年孔非斯从即将倾覆的泰坦尼克号上穿越到了“漂来城”。“孔非斯”的名字源自孔子的英文名“Confucius”，春秋时期的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四处寻觅，四处碰壁，期盼得到明君青睐，和弟子们一道伸展治世才能。金发碧眼的孔非斯

也在寻觅，穿越时代寻觅莉莉。在寻觅的过程中，孔非斯和“漂来城”有了千丝万缕、不可割舍的联系，面孔也在某次穿越中本土化，变成实实在在的中国人了。最后，孔非斯像孔子回归鲁国一样，奔“开往美国的轮船”不顾，回归“漂来城的池塘”。

“漂来城”和“莉莉”皆是隐喻，孔非斯寻寻觅觅，和漂来的各色人物周旋，见识这些人物的繁盛和衰落。“漂来城”“莉莉”象征着时代和命运，被时间裹胁的、不可避免被侮辱和损害的时代，在侮辱和损害中茁壮成长的命运。命运的象征“莉莉”需要做白日梦，“梦是这世上最美的事物，我则是她做过的最美的梦，这梦超出了所有人包括她自己的想象。只可惜她无法知道这梦最后会变成什么，这件事必须由我独自完成。”孔非斯是时代的见证者，在结尾仍然执著地寻觅“莉莉”，在鱼贯而出的女郎行列中，他窥见了“她们眼角上的鱼尾纹、松弛的眼袋和下巴上的赘肉，她们的皮肤肿胀而粗糙，仿佛晒干的橘子皮，脸上是筋疲力尽的无所谓，好像在表示，她们已经接受了这一切来自时间和命运的摧残。整个世界都老了，他想。”

然而时间有规律地摆荡，有时，世界又年轻了，开始躁动，生活的磨盘徐徐转动，把时代磨成粉末。《世纪列车号上的漂亮女孩》是关于“急剧变化的现代历史”，这本短篇小说集便讲述了普通人乘坐自身命运的小船，随着时代漂流的故事。这些人的名字普普通通，就像你我身边的某人，有着特有的时代记号。开篇的《大师》是孙健敏大学时写

就，时隔这么多年再读，一点都不落伍，却像关于时代的“谶语”。“大师”这个名词在网络时代已经大变味，不再让人肃然起敬，有种戏弄意味。大师出场时，大师的称号尚余一丝威严，大师本人却卡在时代的夹缝中。凭借体制的余威分得城郊的三室一厅，却被资本的象征“农民企业家”撬走了情人。他已经享受不到“逝去的美好年代”中大师应该享有的“古典优渥待遇”了。大师的存在感日渐稀薄，心绪狂乱，无情地杀掉“心目中的未婚妻小张”，靠着吞噬一次一级生物链上的生物，向无情的时代彰显他的存在感。小说的结尾，大师以消费时代光怪陆离的方式名扬天下，成为“大师”后，恰到好处地死去。

“直到大师的尸骨在泥土、空气、阳光以及水中化为灰尘，大师仍然被我们所怀念。”大师的逝去象征着“古典的理想主义时代”的终结。资本和消费时代拉开了序幕。世纪之交缓缓奔向我们，崭新的世纪号列车呼啸而来。

《世纪列车号上的漂亮女孩》中，主人公背着豪华马桶登上了崭新的世纪号列车，遇见了象征“时代新希望”的漂亮女孩华晓诗。她的一切都是崭新的充满希望的，华晓诗踏进资本市场的浪涛中，希望凭借崭新的漂亮在资本市场的上层觅得立足之地，获取幸福生活。然而“世纪号列车”是一列诡异的“鬼火车”，蚕食着世间诸人的灵魂和青春。簇新的漂亮女孩，注定被残酷的资本市场利用、磨损、抛弃，被急速奔驰的“世纪号列车”甩出机体之外，被变幻的时代飞速代谢掉。